

美國因應中國崛起與對台灣的啟示： 正和零和的評估與因應

初國華

台南大學助理教授

摘 要

1978 年後，中共改革開放的高速經濟成長漸崛起為區域強權，這反映在國際社會則激起中國威脅論卻也伴隨中國崛起的氛圍。中國週邊或亞太國家如美國，其內部會如何評估與因應潛在的競爭者或強權中國以維持美國的亞太霸權與利益，而東亞相關國家也同樣會感受崛起中國帶來的影響與因應困境，為因應上述政策困境，美國逐漸發展出政策不連續的二元因應策略來面對崛起中國的敵友兩難困境。基於國際政治社會化的政策學習，在以美國為主導的政略啟示下，台灣面對中國崛起的敵友困境或抉擇難題，其應然走向的選項為何？這是本文之研究目的與動機。本文從 Thomas Christensen 的正和與零和概念來探討美國或台灣的二元性因應評估與策略。基於政策模仿與學習，則美國的策略靈活性與政策不連續的彈性應對，應對台灣的立場與觀點有所啟發與導引。

關鍵詞： 台海戰爭論、正和觀點、零和觀點、兩岸關係、政策學習

America Deal with China Rise and Taiwanese Enlightening : the Estimating Perspective of Positive Sum and Zero Sum

Gwo-Hwa Chu

Assistant Professor of National Tainan University

Abstract

After 1978, Chinese reforms and openness resulted in fast speed growing of economy and rising a regional power. This reflect companying as the mood of “China threat” and “China rising” in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he Chinese neighbors and Asian-Pacific state as America, how to estimate and deal with the potential power the China as to sustain state’s interest is a great issue. Otherwise, the relative countries of the neighbors will be impacted the China rising as well. Whether China threat or China rising should shape a dilemma of policy for the relative governments. Thus, the U.S. has developed a dual strategy gradually to address the dilemma of a friend or a enemy. Based on the policy-learning of social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nd to view the American dual policy as the benchmark, then how is the normative options for Taiwan confronting the China rising. This article adopts the concepts of Thomas Christensen about the perspective of Positive Sum and perspective of Zero Sum to study the dual strategy of U.S. and Taiwan. Based on imitation and learning of policy, the American policy elasticity shall enlighten Taiwanese position and options.

Key word : Taiwan-Strait-War-thesis 、 Perspective of Positive Sum 、 Perspective of Zero Sum 、 Both-sides relationship 、 Policy-learning

壹、前言

1978 年中共改革開放的高速經濟成長漸崛起為區域強權，這反映在國際社會則激起「中國威脅論」，卻也伴隨「中國崛起」氛圍¹。在蘇聯瓦解的後冷戰時代，導致亞太區域間的「權力真空」更加深中國崛起的影響力度²。中國週邊或亞太國家如美國，其內部會如何評估與因應潛在的競爭者或強權中國，以維美國的亞太霸權與利益。其次，東亞的相關國家也同樣感受崛起中國 (rising China) 所帶來的影響與因應困境 (中國時報 2006/3/17)，為因應上述政策困境，美國逐漸發展出政策不連續的二元 (dual) 因應策略³，來面對崛起中國的敵友兩難困境⁴。基於國際政治社會化的政策學習 (policy learning)，在以美國為主導的政略啟示下，台灣面對中國崛起的敵友困境或抉擇難題，其「應然走向」的未來選項 (option) 為何？。相對於美國的二元性因應策略，則台灣政策的「二元不連續性」在那裡？亦即，台灣在面對相同困境時，其政策彈性與靈活性又何在，以走出類似「統獨爭議」的僵化與對立。是以，美國的策略啟發性與參考性就顯其價值。從美國圓熟的政策不連續性操作，對比台海間的對立緊張與政治僵化，似乎顯示台灣政策「二元不連續性」的缺乏，這也適足解釋「台海衝突論」或「台海戰爭論」的根源與問題本質。因此，本文第四節「台灣對中國崛起的觀點與立場」是兩岸長期對立與意識型態僵化的緩和建言。此建言的內涵主要在鋪陳「小國理論」論述，來填充台灣的「政策二元不連續性」所留下的戰略缺口與國家策略選項。基本上，國際間的實力差距與對比雖屬現實主義 (realism) 的範疇，但相對小國的台灣沒有足夠的籌碼來貫徹政策的有效性，因此發揮軟權力 (soft power) 或建構主義 (constructivism) 的「非物質權力」主張，可能是台灣的最佳策略 (best strategy)。另一方面，崛起中國對台灣的衝擊應受美國策略行為的影響與啟發。因台灣議題總是「美中」關係或國際結構的一環 (于有慧 1998, 7; 包宗和、吳玉山 1999, 25)，面對崛起中國對台灣的深廣影響，究竟它是伴隨台

¹ (司馬達 2005); (美國之音中文網 2003); (人民網 2005)。

² 冷戰時代的美蘇兩極對立瓦解，蘇聯撤出後，區域性權力的相對真空與掣肘力量解除，無疑將增加中共的影響力與權力施展空間。然而，卻也使中共直接面對美國的權力挑戰。

³ (Terrill 2005); (Hyde 2006)。當美國面臨中國崛起與政策選擇困境，經常是以「模糊策略」的不連續二元作法作為彈性因應。

⁴ 本文主要以正和 (positive-sum) 及零和 (zero-sum) 概念指標來總括此政策不連續的因應策略，這是 Thomas Christensen 用以評估與論述崛起中國對區域的影響與美國外交政策的應然走向。See (Christensen 2006, 81)。

灣成長的機遇，亦或威脅生存與發展的挑戰與危機？事實上，美國的政策反應對台灣都深具啟發與參考價值。

本文從 Thomas Christensen 的「正和」與「零和」概念來探討美國或台灣的二元性因應評估與策略。就台灣立場而言，賽局理論 (game theory) 的正和觀點 (positive-sum) 意味視崛起中國為機會；而零和觀點 (zero-sum) 則視其為危機與挑戰。基於後冷戰時代傳統意識型態對立的瓦解與模糊化，以及美國及其盟國與相關國家的政策因應困境，則任何單一的評估指標 (如正和、零和概念或交往策略與圍堵策略)，都無法充分詮釋「美中台」關係或崛起中國的現象複雜性與牽連性，且任何單一詮釋指標與評估取向，都可能使相對應的「政策處方」處於真實情境的左右為難與進退不得，也不利政策的彈性化應變及創造可能的迴旋空間。因此，美國的對華 (中國) 政策可謂是政策不連續性操作的最佳典範。其次，本文的問題意識還在於，美國在後冷戰時代面對崛起中國的權力挑戰與因應需求 (policy required) 應不比台灣小，但美國經由策略的靈活應用遂使中美兩國有建設性關係⁵；對照下，台海兩岸卻僵持於早期的「漢賊不兩立」與當今的「統獨爭議」或「一中爭議」。基於政策模仿與學習，則美國的策略靈活性與政策不連續的彈性應對，應對台灣的立場與觀點有所啟發與導引。雖然，兩岸的海基會與海協會自 2008 年已簽署「四項協議」，但這只是兩岸關係暖身的起點，且前景仍充滿挑戰與不確定性。相對的，兩岸自八〇年代相互交流以來，一二十年間兩岸經歷台海飛彈危機、「文攻武嚇」與「台海衝突論」，並成為國際間的戰爭危險地區。因此，兩岸關係仍處於「政冷經熱」的格局，這是本文主要的探討動機所在。雖然，「台海衝突論」的引發主要是由於政府間的意識型態作祟，但本文擬從政策靈活與對應政策困境的觀點，來導引台灣因應的政策參考、模仿或學習。

貳、中國崛起的區域現象與美國的政策反應

一、中國崛起的區域難題

伴隨中國改革開放的強勁經濟成長與其他層面的外溢 (spill-over) 效果，於是區域間甚至世界層面響起「崛起中國」的氛圍與現象。中國的影響力在區域間幾乎反應在所有的政策層面：經濟、外交、軍事並同步伴隨中國在世界舞台的活躍 (Shambaugh 2004,9)，幾乎沒有任一世界市場找不到中國的影響，中國既是

⁵ 2003 年 7 月，前美國國務卿鮑爾指出，當前中美關係是三十多年來最好的。請閱「美中應共進不是遏制」，Nov 15, 2004，<http://www.tnn.com/cna/news.cfm/041115/110>

WTO 會員也是聯合國安理會成員國，且一系列其他的國際結構與組織都可發現中國影響 (Hyde 2006)。另一方面，雖然中國正在東亞區域崛起，但區域國家或強權間仍有衝突的可能 (丁永康 2001；曾章瑞、廖天威 2001；Friedberg 2005, 7)，只是中國的領導者似乎無意挑戰美國的軍事霸權，他們仍致力於經濟發展以及贏得國際間的大國地位。美國前國務卿布里辛斯基 (Zbigniew Brzezinski) 指出，目前中國的領導者顯得理性、精於算計且不僅注意中國崛起，也意識到長久以來存在的缺點與問題 (Brzezinski 2005；Lampton 2006)。當中國的區域角色增加以及在地區的影響力茁壯後，則中美間難免會有磨擦並導致美國的權力與影響力可能逐漸衰退 (Friedberg 2005；Okimoto 1996)。但美國仍有可能避免新興強權崛起必然伴隨負面結果的「鐵律」⁶。對台灣而言，中國崛起意味經濟發展、政治地位與軍事現代化等議題在兩岸間已產生政策困境或已擴大既有的困境，並使台灣面臨「中國崛起」究竟是機會性抑或是危險性的抉擇兩難 (Yang 2006, 19)。在東亞地區，中國的崛起主導大多數區域政策的討論與關注，幾乎在每個區域政策的領域，中國的崛起都標示新的挑戰與帶來深遠意涵，這在東亞間已深刻改變區域權力結構與區域系統的本質 (Yang 2006, 2)。

中國崛起透過「雙邊外交」、「多邊外交」與「經貿外交」的熟練操作已在東亞地區贏得聲譽 (Shambaugh 2004, 64)，結果使大多數區域國家現在視中國為「好鄰居」、建設性夥伴與傾聽者以及沒有威脅性的區域強權。這觀點是讓人驚訝的，因為在幾年前，許多中國鄰邦還表達對中國即將主宰區域霸權與軍事威脅而感到關切，但現在這些聲音都已消失。若從「機會與風險」的評估角度，則先前「東協國家」或中國鄰邦發出中國威脅論的警訊與憂慮，應是對中國崛起的初步反應。然而，如今的「消音」只能視作各國對中國崛起的評估與觀點，已由風險或威脅的認知轉為成長與共榮的機會評估了。這恰足說明「東協加三自由貿易區」的成形，以及中國在區域影響的增加 (Shambaugh 2004, 65)。隨中國崛起，其週邊國家也重新調整與中國的關係以及區域間的國與國關係。當中國影響持續成長，許多國家已視中國為領導者，或至少在國家決策過程注入中國的利益與關切。其次，亞洲的「次區域」如東北亞、東南亞、南亞、中亞以及大洋洲也正面臨漸增的互動性與互依網絡 (Shambaugh 2004, 65)。總之，面對廿一世紀，區域間的主要趨勢是國家間與非國家角色的互依與合作，而中國正是這些活動的中心。到目前為止，區域間的評估觀點與認知意識已逐漸視中國是現狀的強權，這與 1950 到 1970 年代對中國的負面印象是不同的，今日中國是輸出善意與商品

⁶ 本文以為透過正和與零和的策略不連續性操作，則美國的政策目標可使國際關係鐵律之惡果，產生延遲或不利降至最低。

來代替暴力革命、軍事武器與意識型態 (Shambaugh 2004, 65)。

二、美國的因應困境

國際社會及其結構在後冷戰潮流的和解氛圍下，中國崛起經常伴隨國際間的互依與經貿交流，但 Joseph Grieco 提出「互依的限制性」以為，外界可能預期中國將滿足於東亞的現況與國際秩序。雖然，中國會透過「多邊主義」、「睦鄰政策」、聯合國的「維和行動」以及加入 WTO 等政經層面操作使現存的世界政經體系有利於中國。但基於國家的權力極大化假設，若中國願冒險且這冒險將進一步改善中國在東亞的地位與利益則情況將會如何？是以，美國面對中國在亞洲的崛起，依新現實主義 (neo-realism) 觀點，美國的「交往政策」是不可能產生百分之百和平、負責與民主的中國，卻百分之百產生更強大的中國 (Grieco 2002, 36~37)。Joshua Kurlantzick 則強調中國崛起的危險性而指出，中國正發現外交上的軟權力 (soft power) 且中國軟權力是如此的快速散播，使中國可能成為繼蘇聯崩潰後，第一個在國際系統挑戰美國控制力的國家 (丁永康 2001)。從大國競爭的權力觀點，John Mearsheimer 則對中國的崛起也採悲觀看法，他認為中國不可能和平崛起。一個逐漸強大的中國，可能試圖將美國勢力逐出亞洲，就像美國曾把歐洲強權逐出西半球。在未來數十年，若中國經濟仍強勁成長，中美可能會有安全競爭緊張而升高戰爭的潛在性。因此，美國對待中國的方式可能轉變成冷戰時期對待蘇聯一般 (Mearsheimer 2005)。John Mearsheimer 也指責美國採用建設性的交往政策⁷，他相信這誤導性的政策奠基於錯誤的想望，以為國際的交往中國只是使中國更具合作性。事實上，這將使中國更強大。Mearsheimer 指出，中國的國力距離區域霸權仍有相當差距，所以美國若要減緩中國崛起的時機仍未算晚，且基於國際系統的權力均衡，若中國崛起伴隨不對稱的擴張性，則不久將來美國將被迫放棄對中國的建設性交往 (Hyde 2006)。Dale Copeland 也有相同結論說，假如廿一世紀初的十年，中國持續高成長則估計美國的對華政策將在政策分類的光譜上走向「僵硬路線」的一端，亦即冷戰型的圍堵策略 (Copeland 2000, 244)。

其實，美國正遭遇政治系統複雜與轉型的中國，究竟中國會在世界舞台如何行動 (Shambaugh 1996)？有經濟評估指出，中國在二十一世紀有可能成為世界前幾大的經濟體，且中國的國防預算自 1989 年以來，幾乎年年以兩位數成長

⁷ 關於建設性交往，美國前助理國務卿 Robert Zoellick 提出負責任的利害關係政策 (responsible stakeholder policy) 來代替中美間的建設性交往，See (Hyde 2006)。

(2003 年成長 11.7% 是唯一例外)。縱然，中國威脅論在短期的未來對美國仍非事實，但長期間可能成真(林文程 2005, 54)。因此，最被國際關係學者問到的問題之一是，在未來的十年或數十年，「美中」將如何管理其間的關係？但華盛頓對中國崛起的觀點與態度是複雜與微妙的(Yang 2006, 13)，美國政治菁英對中國是否會對美國構成威脅或何時會對美國構成威脅，甚至對中國軍事力量與國際地位大小也都缺乏一致的看法(Christensen 2001, 35-40)，連帶對於美國應採何種政策反應也沒有產生共識。有一派主張採取交往政策(engagement policy)即在各種政策領域儘可能維持和增進對中國的關係(Ross 1997, 42-51; Shambaugh 1996, 180-209)，例如增加各種軍事交流、避免與中國衝突、鼓勵和支持中國參與區域性安全組織，希望藉各種交流使中國習於國際規範、增加中國對現存國際體系的利害關係及促使中國開展政治民主。另一方面，如柯林頓總統於 1999 年 7 月 27 日，對眾議院通過給予中國正常貿易關係地位發表談話表示，「正常貿易關係將促使中國融入全球經濟，強化中國內部市場取向改革者的地位」、「擴大貿易將因工具、接觸和觀念擴散而促進自由，可幫助帶來更大的社會改變」(Frazier, Mark and Hansen, Peter 2004)。第二派則主張對中國採取圍堵政策(containment policy)，他們不認為中國會遵照國際規範，也不認為中國可以民主化。他們指出，中國縱然民主化也會在民族主義鼓舞下而同樣好戰。因此，他們主張力求減緩中國整體的經濟發展，尤其避免提升中國的軍事能力與限制中國擴展國際影響力，其目標在避免增加中國的權力擴散(Khalizad, Zalmay et al. 1999, 63-75; Shambaugh 1995, 243-244; Rachman 1996, 129-139)。若第一派的「交往主張」成為主流，則美國將希望將中國納入 WTO 來促使中國遵守世界貿易體系規範與國際法律規則，及促使中國加速內部的經濟體制改革，使中國儘速去除共產主義計畫經濟，並希望隨經濟體制改革加速中國的政治自由化，以及鼓勵中國改善人權紀錄，並提高美國影響中國行為的能力。然若第二派的圍堵主張佔上風，則美國將採取策略防止中國繼續強大，以免中國未來挑戰美國的單極獨霸地位。但 1990 年末期，美國卻出現第三種戰略思維，即主張對中國既圍堵又交往的圍和派(congealment)：一方面，繼續與中國進行交往以鼓勵中國融入國際體系成為支持現狀的國家，但同時加強與包括台灣在內之東亞國家的安全合作關係，並針對與中國可能發生的衝突部署美國軍力。另一方面，若中國違反國際規範或破壞國際和平，美國也會斷然對中國採取制裁措施或強制反應(Khalizad, Zalmay et al. 1999, 63-75)。

參、美國對中國崛起的正反評估與因應

1991 年後的後冷戰時期，若檢視美國對中國及其鄰邦的政策有效性，可有兩個競爭觀點，此即「正和」與「零和」的評估觀點與參考指標。基本上，大部份國際政治關係都會落在這兩者間所形成光譜的某位置 (Christensen 2006, 81)。其實，「正和」觀點與「交往政策」具有類似的詮釋意涵與價值性的共享模式；而「零和」觀點與「圍堵政策」則具有重疊性的語義分享與共通性。只是正和與零和具有賽局理論 (Game Theory) 的競局觀點與計算性；而「交往政策」與「圍堵政策」則是鮮明的政策主張或對策。不論是鮮明的政策主張或抽象的評估指標，都顯示美國面對崛起中國的新局面，某種特定的策略或政策工具都無法有效管理或掌握複雜的東亞情勢。反而，看似相反觀點的正合與零和評估指標與政策操作，卻有助於原先目標的穩定性與有效性⁸。是以，謹慎操作策略的「不連續性」或混合性的政策方案，適足以在複雜情勢的「轉折點」或一旦客觀情勢出現與既定政策目標或預期相反的狀況下，能保證美國的國家利益以及區域盟邦的穩定與繁榮。

正和觀點以為，美國、中國及其他區域性的國家角色，都有動機增加彼此的互信、透明度以及經濟連繫，這些努力都可將軍事衝突的可能性降到最低。畢竟，軍事衝突對國家間的利益都沒有好處，中共需要和平的國際環境而美國的國家利益也是一個和平與繁榮的東亞情勢。就正和觀點而言，後冷戰時期，美國的東亞政策較諸九〇年代之前是成功的。因為，該區域比冷戰前享受更深的經濟互依，且隨北京在國際政經影響增加以及營造和平國際環境的國家戰略，外加美國督促中共融入國際規範的勸誘，都使北京承諾扮演積極角色以維亞洲的和平與穩定 (Shambaugh 1996)。另外，中國已變成區域整合中心，這增加北京與鄰國合作的動機，這些地區包括美國的盟邦與友好國家，這些外交舉動與經濟現象都將有助於「較低階」議題的合作，並避免緊張升高以及減少誤判的發生。「誤判」與「緊張升高」經常在國際格局 (結構) 變遷之際，惡化國際社會的關係與環境 (Christensen 2006, 82)。

相反的，另種零和觀點以為，中國權力與影響力的持續增加，對美國長期的國家安全與經濟利益都將產生危險，這對東亞的美國盟邦也如此。不管在這十年

⁸ 例如，當中共的擴張性衝撞美國區域霸權的權力平衡，或若中共對台的強硬路線危及台海的權力穩定，則美國的政策操作將從正合的一端往零和方向傾斜，即圍堵的政策路線與色彩將壓過交往者。

內，北京與美國及鄰邦的關係是多麼建設性與友好，都無法改變這種潛在的危險性（Christensen 2006, 81）。表面上，似乎沒有辦法在正和與零和，這兩個相反與對立的觀點間找到調和與妥協。然而，卻有兩個理由指出這兩者是可共存的⁹，特別是在政策領域裏。Christensen 指出，首先在政策決定時，可針對分析所列的規則或前提條件與狀況，而採用第一個觀點（positive-sum）或第二個觀點（zero-sum）的邏輯以形成特定的政策或方案。其次，如果美國對中國或對該區域的政策處方究竟是由「第一個觀點」到「第二個觀點」或由「第二個觀點」到「第一個觀點」？若不很明顯時，在這情況下，則這兩種觀點就有共存的空間（Christensen 2006, 83），例如國際政治「第一個觀點」的處方認為，美國對中國應包容與再三保證，就如交往策略一般。但「第二個觀點」的處方，就是圍堵中國。然而在各種情況與層面上，這兩觀點並沒有分出那個觀點或政策處方應具有特別的優先性。在美國的策略操作上，第一個觀點可視實際情況而部份性的伴隨美國的強硬政策¹⁰，而第二個觀點最好伴隨美國能接納與包容中國在經濟與外交的崛起¹¹。所以，美國對中國以及該地區的策略是混合「第一個觀點」與「第二個觀點」的思考，這將減少中國對外關係的不穩定與衝突性也可降低中美關係的緊張及誤判機率（Christensen 2006, 83）。

依正和觀點，九〇年代美國對東亞的區域政策，包括對中國的政策是成功的。東亞地區已深深經歷穩定因素帶來的實質成長，如區域經濟的深度整合與「多邊機構」已囊括該地區的主要國家等等（Zoellick 2005）。但從零和觀點，並不贊同這些想法與作法。零和觀點者相信，美國對中國的鼓勵與放任是不智的，中國在區域間或世界上的經濟與外交權力，在未來會傷害美國的國家安全與利益，即使短期內中美的衝突可避免，但最後美中在東亞地區甚至世界層面的領導權之爭，可能導致兩國即使不產生熱戰也會是冷戰。從零和競爭觀點，一個強權的「獲得」將被視為另一強權的「損失」（Zoellick 2005）。高度的經濟成長已使中國在東亞地區的權力成長足以與美國較勁，中國崛起已使週邊國家相形失色包括美國的盟邦日本、菲律賓、南韓和泰國，且中國的經濟力有助於軍事的現代化。事實上，中國軍事的快速現代化集中於九〇年代晚期，其軍事預算在 1999 年到 2005 年都有高速成長，且增加對台灣的飛彈佈署。中國正在發展與進口來自蘇聯的武

⁹ Ross Terrill 提到美國的政策不連續性或正和與零和的兩手策略，有些像中國文化中的「陰陽觀」， see（Terrill 2005）。

¹⁰ 例如中美間已在諸多議題層面相互合作與協調，但布希總統也一度定義中國為戰略競爭對手，並在區域間加強與盟邦的雙邊關係，以形成「軟圍堵」態勢。

¹¹ 例如，後冷戰時代，美國改變「重歐輕亞」政策並在關島構建大型軍事基地與加強「第二島鏈」防衛圈，但中國影響在區域間仍持續增加。

器系統如潛水艇及巡弋飛彈，這些都是美國及其盟邦所關心的（Friedberg 2000, 18~19）。但零和觀點認為，中國對其鄰邦的外交包容以及積極參與區域間的國際建制與組織，可視為是從區域間驅逐美國勢力之策略的一部份，這也將使區域間的國家跟隨或包容中國的崛起，而不是靠近美國來牽制中國（Friedberg 2000, 24~25）。一位零和觀點的分析家指出，在短期間假如中國對鄰邦能多少避免過度的高姿態與野蠻態度，這將幫助北京達到夢想中的境界，亦即把美國勢力趕出東亞而不費一槍一彈（Friedberg 2000, 26）。零和觀點也指出，美國在中國大陸的經濟利益將傷害自身策略的有效性與可行性，這也解釋華府未能產生一致的努力來降低中國的成長與勢力擴張（Weinstein 2005）。然而 Robert Kagan 相信，美國圍堵中國的努力已開始，Kagan 以為華府被正和觀點的「自由理論」所誤導，這觀點認為中國的崛起是和平且與美國的利益一致。但美國是否能避免區域間一旦發生的緊張與衝突以及面對中國的不確定性敵對（Kagan 2006, 103）？關於這問題，美國應仍將操作與調整策略的靈活性來因應，至少仍無證據顯示美國的策略不連續性與彈性因應的有效性已降低或消失，且美國的對外政策自有其一定的穩定性與一致性（容安瀾 2007）。因此，美國的靈活因應與矛盾策略或彈性策略勢必在未來仍持續一段時日。

正和與零和的世界觀似乎緊張與對立，但卻相反相成與相生相用。這充分表現在美國對中國的政策混合著交往與圍堵，但中國的經濟成長已成為區域經濟整合的火車頭，而中國外交的活躍性已成為東亞「多邊主義」的中心，且由於中國成為國外直接投資的熱門標的，這將導致區域間經濟互動的國家，一旦產生衝突的投鼠忌器，因而增加國際間的糾紛成本與敵對顧忌。從正和觀點，中國的經濟改革與吸引國外投資，將產生「溢外效果」而營造較和平的國際環境，這其實也證實正和觀點對和平預期的價值性與有效性。但從零和觀點，中國對所有區域國家逐漸增加的重要性，意味美國角色與影響力的相對減弱，這說明中國在鄰邦間獲得權力或影響力是以犧牲美國為代價的（Christensen 2006, 105）。然而，若要解決零和競爭的權力失衡，則加強區域間的經濟互依是良好的解決方案，但如果目標是要限制中國的影響使侷限在區域間以及關注中美的權力消長，則較低程度的整合是可欲的。因為，區域各國仍高度依賴美國，且各國彼此間仍保持相對獨立性（Christensen 2006, 105）。另一方面，2005年6月，美國官員希爾（Christopher Hill）在國會聽證中指出，美國希望中國更積極參與區域性與全球事務（Christensen 2006, 106）；前美國助理國務卿佐立克（Robert Zoellick）在一次中美關係演說中也指出，鼓勵中國參與區域間的經濟與外交事務是美國「交往策略」的內涵（Zoellick 2005）。基本上，這是美國官方明顯的正和觀點並融合美國的實際作為，例如在經貿與其他安全議題的中美合作。事實上，中國成功的在

東亞及第三世界擴展政治影響是伴隨經濟勢力的合理演進。然而，對美國而言，這可以不被視為零和對立。前柯林頓政府的亞洲事務官員 Kenneth Lieberthal 強調，美中的經濟與外交關係能對這兩個國家產生雙贏狀況 (Nai-Kuo 2005)。然而，觀察家主要關注大國間區域性的霸權競爭，這很大程度是零和與對立的 (Hyde 2006)。基本上，中國在經濟、軍事與政治權力的漸增可能使一些亞洲國家如澳大利亞、菲律賓、南韓和泰國較無意願與能力協助美國，來制衡中國在未來的權力成長。另一方面，目前台灣雖然比 1993 年更有獨立情緒，但台灣也關注與大陸的經濟互依以及威脅性的軍事布署 (Nai-Kuo 2005)。

Christensen 認為，目前美國的對華 (中國) 策略，不是純粹的正和或零和。美國對華政策總是落在正和與零和連續光譜的某一點或某區域。基本上，五〇、六〇年代，美國對蘇聯與中共的冷戰式圍堵是完全接近「零和」的一端，這與 1978 年後的對華政策主軸，既融合交往與圍堵是有差異的。雖然，有中國學者指出，冷戰後，美國就已對中國採取「圍堵策略」。然而，Christensen 批評道，似乎也沒有一個國家能比得上美國在 1978 年後的改革年代，造就出中國的強大與影響力擴增 (Christensen 2006, 108)。但零和式的競爭思維確實存在美國的對華政策，特別是在軍事領域。事實上，區域間的敵對與緊張提供東亞各國與美國產生聯合防禦的需求，例如 2005 年初，中共以「反分裂法」威嚇台灣，就正和觀點而言，這對國際情勢是糟糕的事，但卻合於零和觀點的對立競爭邏輯。從激進的零和觀點而言，驅迫中國對台採取苛刻政策，除可彰顯「台灣關係法」的保護作用也使美國得到實質的政經利益，以及維持區域的權力平衡，這甚至是符合美國的長期國家利益 (Christensen 2005)。但在許多情況下，正和與零和的世界觀可能不是「極」的對立，例如在東亞地區維持美國軍力優勢，從零和觀點這具有真理般的價值，但正和觀察者對這問題也會認為是重要與必須的。因美國為該地區的國家提供共同安全保證，不但維護區域和平與繁榮也有助於美國利益的增進。另一方面，這兩個世界觀或策略 (正和與零和) 也會在美國的兩岸政策產生重疊現象，如這兩個觀點都主張美國應採嚇阻政策以免中共的武力犯台。另外，布希政府的政策也曾同時滿足這兩種觀點，如 2004 年以來，兩岸緊張明顯降低可視為美國對台灣問題的節制與合作，同時也是美國與中國作零和式權力競爭的佳作 (Christensen 2006, 110~112)。

依零和觀點，在亞太地區美國為維持權力平衡與既得利益，則均勢與競爭將繼續是美國的政策主軸。關於對中國的政策，維持 1970 年代以來「三報一法」基於「一個中國」，台灣問題由中國人自行和平解決。此種台海雙邊的平衡政策最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謝敏捷指出，後冷戰時期美國與中共仍會積極交往但不會像盟邦一般親近，也不會如冷戰時期的全面包圍與對抗。亦即，美國對中共進

行「有條件交往」也就是所謂的「軟圍堵」（蕭全政 2006；彭建雯 2000, 66~67）。同時，美國在與中共進行經濟合作時，還兼用政治與外交手段促使中共納入以美國為主導的國際體系，其政策目標在使中共不再形成區域威脅（謝敏捷 1998, 188）。基本上，美國為求掌握東亞局勢及有效面對與因應崛起中國的新情勢，就以正和與零和的不同觀點，依不同情勢與客觀需要，靈活運用「交往」與「圍堵」的政策與作法。當中共的擴張危及權力平衡，則美國的政策氛圍將傾向零和策略；但當美國為獲取經濟與外交利益則採正和策略。是以，美國的政策不連續性操作，可確保政策領域在複雜區域與「轉型中國」的特殊狀況下，作出最有效與最適當的反應以確保政策目標的實現。另外，鄭家慶指出，當前美國的對華政策已無法以過往「零和藍隊」與「正和紅隊」的標籤二分之。因為，當前美國對中國持雙重看法：中國既是威脅也是合作夥伴。因此，對中共角色的認定會因議題不同而異，如前國務卿鮑爾（Colin Powell）雖在錢其琛訪美期間重申「一中政策」，但也表示關注中共對台灣軍事威脅的強化（鄭家慶 2003）。

肆、台灣面對中國崛起的觀點評估與立場調整

從台灣立場而言，正和觀點意味評估與認知中國崛起為機會；而零和觀點則視為危機與挑戰。前海基會秘書長游盈隆指出，面對中國崛起，就台灣而言代表的是機會也是風險（游盈隆 2007, 76）。台灣內部對於中國崛起究竟是機遇還是危機，其間爭議仍有不同的看法與評估。基本上，近十年來中國大陸與台灣及日本的政治關係近乎凍結，但經濟關係則整合的既深且快。目前，中國是台灣對外投資的首要目標也是最大的貿易夥伴，台灣對大陸則享有巨額的貿易盈餘。其實，兩岸關係或雙邊交流如貨物、貨幣、服務與人力自由流動都可能代表雙邊的危機與機會（Naughton, Barry and Yang, Dali 2005, 304）。海峽兩岸的關係既是互利的，同時也是潛在的危險¹²。但朱錦鵬指出，兩岸交流與交往意味某種程度的經濟性、社會性甚至文化性的整合，但整合不應理解為民族國家單向的主權犧牲，而係民族國家間交互影響的聯屬關係（interlock），藉此聯屬過程突顯整合體及參與國的互需與互依（朱錦鵬 1999, 71）。

至於崛起中國的風險評估，基本上國際安全威脅應取決於國家和集團間的政治關係而非實力差距，而政治關係又主要取決於意圖（intention），即一國對於外界是否構成威脅，其關鍵不完全在於國力是否強大，而主要在於奉行什麼政

¹² See, (Bush 2005, 416)。又如中國大陸成為台灣最大的貿易贏餘來源以及對外投資的最大目的地。但中共在台灣對岸卻也佈署近千枚飛彈，徒增兩岸衝突的威脅性與危險性。

策。換言之，對國際安全威脅在很大程度上，並不是國家間的軍事實力差距，而是一國是否宣示稱霸、擴張、侵略及干涉他國事務的動機與意圖（蕭朝琴 1999, 47）。對於國際社會的「敵友識別」，往往是影響國家互動的認知基礎與行為指南。前海基會秘書長陳長文以為，是敵？是友？往往懸諸一念，若你當對方是敵人，對方就必定會是敵人；若你當對方是朋友，對方就有機會成為堅貞不渝的盟友（陳長文 2005）。並且，帶動國際安全秩序轉變的根本因素是對「敵友」識別的轉換，例如冷戰體系的崩解並不是由於東西方陣營的軍事實力出現戲劇性變化，而是對安全威脅認知與敵友定位發生全面性調整（朱雲漢 2005）。前陸委會副主委林中斌指出，新世紀的中共對台政策在於「不戰而屈人之兵」，這是藉由經濟發展、外交封鎖、睦鄰以自重等諸多政策手段來達到政策目標。至於，台灣該如何應對則應是「伐謀」、「伐交」以及「如何能把敵國變成友邦」（林中斌 2004）。

面對國際環境的快速變化，尤其後冷戰情勢對國際政治的巨大衝擊，台灣唯有誠實以對，現實與理性的面對中國崛起的近鄰，才能善用中國所帶來的危機感及其有形與無形的壓力（洪財隆 2006, 13）。如果中國的崛起不可阻擋，則台灣保持靈活的政策因應就很重要，例如美國為因應中共崛起的作法是參與中國的經濟發展以獲取成長利益；同時，將中共納入國際經貿規範與體系（蔡政修 2003, 75）以期降低中國「擴張主義」的不確定與風險。前陸委會副主委高孔廉指出，台灣是小型的開放經濟體，政府的過度干預與限制等於「鎖國」，因為「小對大」的限制並不能相等於或抵消「大對小」的制裁效果，反而卻處處自我設限而喪失先機（高孔廉 2006）。

緣於崛起中國的客觀環境也由於現實的「地緣政治」使然，台灣必須承認自己是小國而非大國（包宗和 1999, 1；Handel 1990, 31~38）。小國唯有安於國際結構的相對安排以達成國家目標（程長志 1999, 25）。因為，小國難以在大國所型塑的規則結構挑戰其核心利益或贏得自身的「偏好政策」。因此，小國應避免「強爭妄為」而應尋求強爭妄為以外的政策或方式，來達成目標或另覓機會。事實上，小國的籌碼相對稀少，難有衝撞或改變國際結構的實力，唯有在既定的國際結構規範下，方有達到國家利益極大化之可能。畢竟，弱小國在資源總量、影響力或權力總和不如大國，故彈性策略或「柔性策略」，反而變成小國有可能致勝的作法。由於，大國或霸權國的優勢地位與權力壟斷，欲屈服小國的國家意志。所以，弱小國採取柔性策略以順適於大國所型塑的國際結構似可免於雙方的權力衝突或利益衝撞，也較易取得自身的偏好結果或政策目標的達成。是以，小國的柔性策略，對大小國雙方而言，都是一種雙贏的選項，而共臻後冷戰時代的和解趨勢。並且，柔性策略較能避免與大國的「流血廝殺」，都應是小國最佳的「藍

海策略」，進而贏得寬廣的生存空間與獲得國際間應有的尊重，例如新加坡是很好的例子與制度榜樣（初國華 2007, 32~34）。如此則有可能獲得大國的默許或合作而不致產生抵制、排擠與衝突的國際現象，且能達到國際間大小國各自的政策目標或雙方皆可接受的均衡點。老子道德經指出，「夫大小國，兩者各得所欲」，這應是大小國雙方共同遵循國際結構規範所帶來的均衡與穩定結果。基本上，國際社會的運作邏輯並不因弱小國的主觀意志而轉移，在「霸權國」型塑與主導的國際秩序與結構裡，弱小國只有調整自身的立國精神與態度才有可能生存或茁壯於世，而不為國際政治或權力所吞沒（初國華 2007, 38~40）。是以，台灣應加強「軟式權力」外交，以軟式權力外交因應中國的對台策略，軟式權力可包括科技、人權、民主、和平、非政府組織、環保、動物保育、人本安全、打擊犯罪和毒品、消除貧窮、社會關懷、市民社會、社區發展等（高希均 2006），藉此迎戰中共的外交打壓而不是以「硬式權力」衝撞中國的軍事威脅。畢竟，大陸大、台灣小。台灣沒有硬式權力的相對優勢以挑釁中國（宋鎮照、黃鴻茗 1996, 33）。相對於現實主義的軍事與政治強制手段，「軟權力」或「有所為而不爭」的觀點，方是小國達致偏好政策的方式也是國際規則與規範所預期的互動方式與境界（初國華 2007, 37~38）。

當小國面對強敵壓境，藉由體察後冷戰時代的國際情勢變化，以靈活的因應策略（如正和與零和的概念或政策處方）來避免遭受各種的內外限制（如兩岸懸殊的物質國力、兩岸關係惡化及其他僵局與爭議），並應用環境所提供的機會（如大國強權間的權力制衡），將使小國有可能扭轉危機為轉機（宋學文 1998, 111）。謝林（Thomas Schelling）在台灣演講時指出，台灣不須擔心兩岸關係會朝發生危險的方向演變，「如果你相信它會有危險，它就有可能會演變成危險關係」，他強調任何國際關係很少是「零和遊戲」，兩岸關係也是這樣（聯合報 2006/11/3）。台灣應完全開放與中國的經貿互動，當雙方互動愈多，依賴愈深則台灣的危機將愈小¹³。雙邊關係愈密切，中國愈不會用暴力破壞這關係（高希均 2007）。台北或難寄望北京能「唯仁者以大事小」，實更應著力於「唯智者以小事大」，以政治智慧化解兩岸僵局與台海危機，台灣既要有所堅持也要保持彈性與創意（Lilley James & Downs Chuck 1999, 34）。

¹³ 區域間的其他國家面臨中國崛起，也會產生機會性與危機性的抉擇兩難，但他們仍選擇與中國更深的整合（如「東協加三」或「東亞自由貿易區」的倡議），這對台灣有兩層啟發，一是與中國整合是區域間的國際社會趨勢；二是，當各別國家在經濟層面與中國整合後，其所獲得的經濟性與其他利益，將使自身的綜合國力增強，這至少有兩種後果：一、該國更有力量與可能來轉化危機為機會；二、該國在享受機會與利益後，能對危機更有耐受力以及衍生可行與有效的「危機管理」。

前海基會副秘書長石齊平指出，台灣應全面加速大陸現代化工作，經濟的、社會的與政府的。就長期而言，這是穩定與維繫兩岸關係的終極法門（石齊平 1996, 14）。這是雙贏或「非零和」的策略觀，但從「冷戰對抗」或零和觀點，則認為加速大陸現代化是「資匪」，最終將反噬台灣並加深台灣的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與威脅台灣的永續發展。然而，回顧二次大戰後，美國資助歐洲的「馬歇爾計畫」以及在亞洲扶持日本，都造成邇後的區域和平與繁榮以及遏抑共產政權的擴張。這是正和觀點所期待與主張的政策預期及結果。相對上，認為中國崛起是危機或對兩岸關係持零和觀點與悲觀傾向者，將擔心兩岸的經濟交流與互依，將遭致中共的政治報復而暴露台灣的脆弱性並衍生安全顧慮，但對待安全困境或評估中國崛起的機遇性與挑戰性，不能只從「不變的中共」看問題（石齊平 1996, 16）。事實上，中共從共產的極權國家走向崛起之路，不但是「列寧主義市場化」的制度轉型與體制變遷，也應是中共在政策彈性與思維活化層面作出相應調整，以應付外界挑戰與「資產階級和平演變」的腐蝕性。此或許可解釋，在美國混合應用「交往」與「圍堵」策略¹⁴後，中共仍在國際社會保持崛起現象。但當中國仍是敵意未明的國家或地區時，台灣的零和觀點或兩岸的悲觀傾向者將擔憂「直航」或過度依賴潛在對手，會加速台灣的經濟空洞化以及失業問題。然而，美國學者包道格（Douglas Paal）指出，零和觀點的憂慮雖不應被忽視，但相關議題應放在更大範疇的全球互依系絡作觀察。事實上，兩岸貿易不是發生在真空中，且兩岸都被連結在世界貿易的結構與框架裡（包道格 2004）。

後冷戰時代的中國崛起，相對於冷戰時代的兩極對立，使美國及相關國家與中國處於既「零和競爭」又「正和合作」態勢。在評估台灣面對崛起中國的反應與自處之道應涉及「美中台」三方關係的參考架構，其間既牽涉權力平衡也須慮及相互依存，應混合使用正和與零和的思維與措施，使「美中台」三方從衝突與合作的矛盾中，逐漸摸索出極大化機會而極小化危機的方法與政策。其實，衝突的各方在維護關係穩定都具有共同利益。因此，彼此須以有效的政略以尋求妥協，以及設法找到紓解矛盾的方法來避免相互關係的嚴重惡化（宋學文 1998, 129）。面對後冷戰時代的新局面，台灣應經由國際社會的學習與借鏡，化解兩岸僵局使衝突的因素減少並增加合作面向，來維護國家利益與增進人民福祉。過去，台灣曾提出「雙贏」概念以代替傳統的零和觀念，其實可進一步提出「三贏」觀念，也就是把兩岸利益和國際社會的利益與趨勢結合，使兩岸關係發展符合世界性或全球化的發展潮流（趙春山 1999, 49）。

¹⁴ 依賽局理論觀點，若無法達到單一性的最佳策略（屬於正和觀點的策略或零和觀點的策略）時，則競局者（player）如美國將會使用混合策略以使收益（pay-off）極大化。

伍、結 論

五〇、六〇年代，美國對蘇聯與中共的冷戰圍堵是完全接近「零和端」的，這與 1978 年之後，美國的對華政策主軸既融合交往與圍堵是有差異的。因此，本文呼籲台灣對中國應有新的態度、思維與政策以符應後冷戰時代的國際潮流。

國際體系的持續發展與變遷已導致相互依存的時代（Keohane and Nye 1989, 262）。廿一世紀是以互依互賴為特徵的時代（顧長永 1998, 108）。其實，兩岸在正常交往情況下，雙方透過信心增進以及誤判與猜疑的逐步降低，將可減少台海衝突與動武的機率，此應為合理的推論，也是避免國際輿論鵲起「台海衝突論」或「台海戰爭論」的有效方法。

因此，在評估台灣面對崛起中國時，不應將兩岸關係封閉於「雙人零和對局」的觀點來看待對方與評估自身的國家利益。相反的，當國際間因經貿或其他因素而愈來愈密切時，台灣與崛起中國的交流或相應政策，其實已進入國際性或全球性的結構系絡。因此，台灣並非在隔絕的空間與中國競爭或「對局」。相反的，卻是在國際社會結構與格局下的兩岸互動或較勁。因此，處於相同境遇或共同面臨崛起中國的相關國家，彼此之間的作法與政策主張都具有擴散性、參考性與制度的可移植性。不論是美國的策略不連續性或其他國家對崛起中國的評估與看法，都可為台灣的參考指標與政策學習依據，例如美國參採正和觀點的交往策略與「新自由主義」的交流合作，以及零和觀點的圍堵策略與「現實主義」的對抗作風，當中共善守國際義務與規範，則美國待之以正和方式來維持繁榮與獲取其他的國家利益或戰略利益。若中共強力衝撞國際均勢則美國有零和式的威嚇與防備。然而，在實際操作上，美國是超級霸權，其政策操作有其特色，自非台灣的模仿與學習所能比擬或能得到相同效果，但策略的靈活與「相反相成」的因應與操作，似乎是緩解兩岸僵局與評估中國崛起的新模式與觀點。

參 考 書 目

- Lilley James & Downs Chuck 編；張同瑩等譯。《台灣有沒有明天？台海危機美中台關係揭密》。台北：先覺。
- 丁永康。2001。〈國際新秩序架構下的兩岸關係分析〉。
<http://ganzhi.china.com.cn/chinese/TCC/haixia/49977.htm>。2001/10/8。
- 人民網。2005。〈美國藍隊時刻準備著〉。
<http://military.people.com.cn/BIG5/8221/51757/52478/52480/3651130.html>。
2005/8/29。
- 于有慧。1998。〈國際因素對當前中共外交政策的影響〉。《中國大陸研究》，41(6)：7。
- 包宗和。1999。〈評亞太經合會柯江會晤後的兩岸關係〉。《共黨問題研究》，25(9)：1。
- 包宗和、吳玉山主編。1999。《爭辯中的兩岸關係理論》。臺北：五南。
- 包道格 (Douglas Paal)。2004。〈台北-華盛頓-北京的三邊關係〉。
<http://www.ait.org.tw/en/news/officialtext/viewer.aspx?id=2004052702>。
2004/5/27。
- 司馬達。2005。〈美國智庫加強中國研究〉。
http://www.zaobao.com/special/china/sino_us/pages5/sino_us050421.html。
2005/4/21。
- 石齊平。1996。《新中國：廿一世紀海峽兩岸的出路》。北市：工商時報。
- 朱雲漢。2005。〈如何看待中國崛起〉。《中國時報》，2005/1/17：4。
- 朱錦鵬。1999。〈區域主義、區域整合與兩岸整合問題之探討〉。《中國大陸研究》。42(8)：71。
- 宋學文。1998。〈小國外交政策的理論基礎〉。《兩岸政治外交總體檢》。周世雄編。北縣：河洛圖書。
- 宋鎮照、黃鴻茗。1996。〈當前兩岸政經關係的發展、挑戰與前瞻：建構新兩岸關係思維〉。《展望與探索》。4(10)：33。
- 林中斌。2004。〈如何能把敵國變成友邦〉，《中國時報》，2004/12/2：4。
- 林文程。2005。〈美中台關係與台海安全〉。《新世紀智庫論壇》。31。
- 初國華。2007。〈不對稱權力結構下的兩岸會談：辜汪會談個案分析〉。政治大學中山所。博士論文。
- 洪財隆。2006。〈從經續會談台灣經濟發展戰略〉。《交流》。88。

- 高希均。2006。〈臺灣的出路、以軟性實力立足世界〉。《聯合報》，2006/3/1：15。
- 高希均。2007。《中國時報》，2007/2/1：15。
- 陳長文。2005。〈兩岸關係的敵乎友乎〉。《聯合報》，2005/8/5：3。
- 彭建雯。2000。〈美國外交政策之分析：從圍堵到新圍堵〉。東海大學。碩士論文。
- 曾章瑞、廖天威。2001。〈美國東亞戰略對兩岸安全互動的影響〉。《國策專刊》。19：http://www.inpr.org.tw/publish/pdf/m19_2.pdf
- 游盈隆。2007。〈台灣政局發展與兩岸關係，兼論海基會的功能與角色〉。《交流》。94：76。
- 程長志。1999。《中共如何談判》。台北：時英。
- 趙春山。1999。〈建構跨世紀的兩岸關係：正視一個分治中國的現實問題〉。《中國大陸研究》。42（9）：49。
- 鄭家慶。2003。〈曹剛川、錢其琛訪美之評析〉，《中華歐亞基金會》。
<http://www.fics.org.tw/issues/subject1.asp?sn=1780>。2003/12/10。
- 蕭全政。2006。〈海陸爭霸中的兩岸關係〉。
http://www.inpr.org.tw:9998/inprc/pub/journals/130-9/m134_1.htm, accessed 2006,2.24。
- 蕭朝琴。1999。〈後冷戰時期中共對亞太地區的外交戰略〉。《共黨問題研究》。25（10）：47。
- 謝敏捷，「台灣安全：決策理論三個層次之分析」，收錄於周世雄編，兩岸政治外交總體檢，初版（北縣：河洛圖書，1998年9月），頁188。
- 顧長永，「論後冷戰時期亞太政經秩序的變遷：兼論我國對外關係的因應之道」，收錄於周世雄編，兩岸政治外交總體檢，初版（北縣：河洛圖書，1998年），頁108。
- 〈兩岸關係不可能是零和遊戲〉。2006。《聯合報》，2006/11/3：6。
- 〈美日澳安全對話對準中國〉。2006。《中國時報》，2006/3/17：13。
- 美國之音中文網。2003。〈布希政府對華政策不明朗〉。
<http://www.voanews.com/chinese/archive/2003-05/a-2003-05-31-23-1.cfm>。
- 2003/5/31，容安瀾，2007。〈美一中政策毋需修正〉，
<http://www.cna.com.tw/CNA/china/SearchDetail.aspx?strCatL=OPL&strNewsID=200710270033&strType=RealTime>。2007/10/27。
- Bush, Richard, 2005. *Untying the Knot: Making Peace in the Taiwan Strait*.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 Brzezinski, Zbigniew,2005.** “Clash of the Titans,” *Foreign Policy*, January/February 2005, http://www.foreignpolicy.com/story/cms.php?story_id=2740
- Christensen ,Thomas,2006. “Fostering Stability or Creating a Monster?”*International Security*,31 (1):81~94.
- Christensen, Thomas,2001. “Posing Problems without Catching up: China’s Rise and Challenges for U.S. Security Polic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5(4):35-40.
- Christensen , Thomas,2005. “Old Problems Trump New Thinking?”*China Leadership Monitor*,13, <http://www.chinaleadershipmonitor.org/20053>
- Copeland, Dale,2000. *The Origins of Major War*. 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Friedberg, Aaron,2005. “The Future of U.S.-China Relations: Is Conflict Inevitabl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30(2):12~29.
- Friedberg, Aaron, “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Asia,”*Commentary*,Vol.110, No.4(November 2000),pp.18~19.
- Frazier, Mark and Hansen, Peter,2004, “China’s Accession to the WTO: A Candid Appraisal from U.S. Industry,” in <http://www.nbr.org/publications/briefing/frazierhansen99/index.html>, accessed 2004/10/26.
- Grieco, Joseph,2002. “China and America in the World Polity,” in Carolyn W. Pumphrey,ed.,*The Rise of China in Asia*. Carlisle Barracks,Pa.: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2002 ,pp.36~37.
- Handel, Michael,1990. *Weak States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London, England: Frank Cass Co.
- Hyde, Henry,2006.** “Chinese resurgence,” hearing of the hou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mmittee ,<http://www.ait.org.tw/en/news/currentissues/060510-ChinaResurgence.asp#top>, May 10, 2006
- Keohane, Robert and Joseph Nye,1989. Joseph,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2 ed .New York:Harper Collins.
- Khalizad, Zalmay et al.,1999. *The United States and a Rising China: Strategic and Military Implications*. Santa Monica: RAND Corporation.
- Kagan, Robert,2006. “The illusion of Managing China,”in Thomas J. Christensen ,”Fostering Stability or Creating a Monster?”*International Security*,.31(1), p.103.
- Lampton, David.2006. “Is China a communist country?” *Dangerous Straits*, <http://www.pbs.org/wgbh/pages/frontline/shows/china/interviews/lampton.htm>,

- accessed 2006,6,23.
- Mearsheimer, John,2005. "Clash of the Titans," *Foreign Policy*, http://www.foreignpolicy.com/story/cms.php?story_id=2740, January/February 2005.
- Naughton, Barry and Yang, Dali, 2005. *Holding China Together:Diversity in the Post-Deng Era*.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Nai-Kuo, Han,2005, "U.S.Adjusting Military Deployment with China in Mind: Schriver," CNA (Taipei),July 13, 2005.
- Okimoto, Daniel,1996. "A United States Policy for the Changing Realities of East Asia: Toward A New Consensus," *Asia Pacific Research Center*, <http://www.strategicstudiesinstitute.army.mil/pdf/PUB208.pdf>
- Ross,Robert,1997. "Why Our Hardliners Are Wrong," *The National Interest*, 49 : 42-51.
- Rachman, Gideon,1996. "Containing China,"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19(1):129-139.
- Shambaugh, David,2004." China Engages Asia: Reshaping the Regional Order,"*International Security*, 29(3):9.
- Shambaugh, David,1996. "China's Transition into the 21st Century:U.S.and PRC Perspectives," <http://carlisle-www.army.mil/usassi/>, July 29,1996.
- Shambaugh, David,1996. "Containment or Engagement of Chin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1(2):180-209.
- Shambaugh, David,1995.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A New Cold War," *Current History*, 94(593): 243-244.
- Terrill, Ross,2005. " The myth of the rise of China," <http://www.onlineopinion.com.au/view.asp?article=124>, 27 September , 2005.
- Weinstein, Michael,2005. "Intelligence Brief:China," http://www.pinr.com/report.php?ac=view_report&report_id=319&language_id=1., June 28, 2005.
- Yang, Philip,2006. "Rise of China and the Cross-Strait Relations," *Tamkang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IX(IV):19~31.
- Zoellick, Robert,2005. "Whither China:From Membership to Responsibility?"speech to the National Committee on U.S.-China Relations, <http://www.state.gov/s/d/rem/53682.htm>., September 21, 2005

(投稿日期：98 年 1 月 5 日；採用日期：98 年 3 月 9 日)